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 和谐文化研究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JINCHENGZHONG DE
HEXIE WENHUA YANJIU

罗本琦◎著

 人民出版社

013056470

D61
3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 和谐文化研究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JINCHENGZHONG DE
HEXIE WENHUA YANJIU

罗本琦◎著



D61/312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段海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和谐文化研究/罗本琦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

ISBN 978-7-01-011805-5

I. ①马… II. ①罗…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②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D61 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3275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和谐文化研究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JINCHENGZHONG DE HEXIE WENHUA YANJIU

罗本琦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1805-5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和谐文化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17
一、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理念	17
(一)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的和谐价值理念	18
(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目标理念	26
(三)制度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战略理念	34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	38
(一)和合思维模式的奠基与和谐伦理话题的提出	38
(二)从修身正心到天人合一:天下归仁的和谐伦理精神	43
(三)天下归仁的和谐价值的实现	56
三、和谐文化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68
(一)文化精神的相通:民族文化融合的基础	68
(二)和谐文化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文基础	72
(三)和谐文化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纽带	79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与和谐文化的发展	84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与和谐理念的发展	84
(一)毛泽东思想的和谐理念	84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和谐理念	100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121
(一)传统文化的时代局限与现代转型问题的提出	122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实现	127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13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与和谐文化的创新机制	140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	140
(二)中国特色与国外先进文化相结合的机制	144
(三)领袖智慧与人民群众智慧相结合的机制	150
第三章 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与和谐文化观的 形成	157
一、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	157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创新	158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创新	165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思想的创新	168
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观的提出及其含义	178
(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观的形成	178
(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观的基本内容	182
(三)和谐文化观与科学发展观	185
三、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观形成的基本条件	190
(一)传统和谐精神的积淀:和谐文化观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	190
(二)党和人民的不懈追求:和谐文化观形成的主体条件	193
(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谐文化观形成的物质条件	194
(四)世界和谐的发展趋势:和谐文化观形成的国际社会条件	197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和谐文化的发展方向	200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200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和谐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200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和谐文化建设的实践依据	209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和谐文化建设的现实要求	218
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出发点与价值原则	222
(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科学出发点	222
(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价值出发点	226
(三)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价值原则	232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239
(一)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态势及其对和谐文化建设的 影响	239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历史	
必然	249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路径	
选择	255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与和谐文化的发展战略	259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259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与时俱进	259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与时俱进	262
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战略原则	264
(一)参与竞争与文化安全并重	264
(二)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	270
(三)文化创新与体制创新同步	274
(四)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调	283
结语 走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强国之路	287
主要参考书目	292
关键词索引	297
后 记	300

导 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华民族谋求民族独立与解放和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或者说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的特定背景下展开的,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双重使命:不仅要解决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还要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种以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为目的的社会思潮,也是一场持续的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同时又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运动。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诞生 9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每一进步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在一起,90 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为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研究背景或者研究视角。

一、文化的含义与和谐文化的诠释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和谐文化?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有什么特质?这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而理论界对此见解不一,因而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

“文化”一词的含义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英国人类学家 E.B. 泰勒在其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

杂的整体,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或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①此后,关于“文化”的诠释层出不穷。到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文中考察的文化定义就有一百多种。

中国学者对文化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

梁启超认为:“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②

钱穆说:“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③

贺麟先生曾在《文化的体与用》中指出:所谓文化就是经过人类精神陶冶过的自然。“文化可以说是精神的文明”^④,“所谓文化,即是人类精神的活动所影响、所支配、所产生的。……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⑤

梁漱溟先生对文化作了极其宽泛的诠释,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之本意,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至于“文字、图书、学术、学校、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⑥。

张岱年先生在《文化与哲学》中也把文化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他认为:狭义的文化指文学艺术;广义的文化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等。社会生活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二是政治;三是文化。就是说,社会生活除了政治、经济之外,一切都可以称作文化。这种广义的文化包含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哲学、宗教,这是社会的最高指导思想。第二个层次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它受哲学、宗教的指导,同时也是哲学的基础和表现。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心理,其中包括风俗习惯以及一

① [英]E.B.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

③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5页。

④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78页。

⑤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80页。

⑥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页。

般人的思想意识。

《辞海》对文化概念的广义解释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这种意义的“文化”概念显然具有外延的广泛性。据此,可以把文化的要素归纳为如下方面:物质要素,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精神要素,包括哲学、各门具体科学、艺术;工具要素,指语言与符号,它是人们用来表达、标记其他成果的工具;规范要素,包括法律、制度、道德以及风俗习惯等人类行为规范以及行为方式。《辞海》所谓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亦即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包括广义文化中的精神要素。^①

在对文化的多元解说中也呈现共识的成分,即把文化看做是人类活动成果,文化似乎可以包罗万象,但不包括客观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有如我们不能把自然生长的山川名胜称之为文化。

东西方学者对文化概念的多元解说反映了人类对文化的认识过程。人们对文化的解释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这里有人类主观认识因素的影响,也有客观的社会发展因素的制约。我们认为,什么是文化?这本身就是一个主观色彩很强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所言:“文化并不植根于绝对之中,它们是人类行动和思想的产物,亦即人造物。文化及其符号既不是上帝所赐也不是自然给予,它们是人工的、人为设计的、可变化的。”^②另一位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的前言中也直言:“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③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视野中,“文化”应当有清晰的含义,而且其含义应当力戒宽泛。综合中央文件以及有关制度,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

① 参见《辞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美]罗伯特·F.墨菲著,王卓君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2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设中的“文化”界定为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①

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化无疑具有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本质上不仅仅表现为其内含要素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表现为文化品质的多样性。这种品质的多样性集中体现在文化内在的价值倾向的多样性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和谐文化”与“非和谐文化”之分。因此,和谐文化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千姿百态的文化按照作为文化基础的生产方式分为史前文化、奴隶社会文化、封建社会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和社会主义社会文化;我们也可以按照不同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一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多样性的文化)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但是我们很难把某一文化归类为和谐文化或不和谐文化。这里,有对“和谐”一词的理解的多样性的原因,也有文化本身价值追求的复杂性的原因。因此,我们毋宁说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基本价值追求的文化理想。

当然,立足当代中国以及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和谐文化应当有其新的更丰富的内涵。我们把它界定为:和谐文化就是以和谐为基本内核和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于一体的一种文化理想。它包括如下含义:第一,和谐文化是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基本价值取向的,“以人为本”是这一价值取向的核心。在汉语语言中,“和谐”一词的创造本来就是与人紧密联系的,在《说文解字》中,“和”字左“禾”右“口”,“禾”是谷类植物的统称,意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口”为人之口,意指人的说话的权利。中国古代关于和谐的种种诠释,都是以人为核心展开的。第二,和谐文化以与社会经济政治协调发展为基本特征,实现社会和谐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哲学意义上的和谐是指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同相成、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文化本来就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现象联系在一

^① 李长春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以下简称《决定》)中说得很清楚:“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处延非常广泛,可以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可以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决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出发把握文化范畴,重点研究部署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相对应的文化建设。”(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1页)

起的,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是和谐文化的应有之义。第三,和谐文化是不断发展着的文化理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其发展的基础。虽然我们可以从特定的角度对和谐文化作一界定,但文化与一切经济政治社会现象一样,是不断发展着的,和谐文化的内涵及文化状态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而发展的。

基于上述思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质的和谐文化,特质当然体现在社会主义特有的价值理念之中。因此,我们认同这样的界定: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发展阶段,是指在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前提下,文化与其环境要素的协调发展,文化子系统之间相互渗透、彼此协调、共同发展的一种新型文化理想。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与文化意蕴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虽然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有过讨论,但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研究的焦点,不过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事。就国内学术界而言,至少有如下代表性的观点值得重视。

第一,从“结合”的角度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就是“结合”。至于“结合”的内容又有不同诠释。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① 有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② 也有人认为,这一结合应当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这三个基本方面。^③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做一个过程。有学者认为,中国革命、建设、

① 参见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参见包心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走向和最新成果》,《山东社会科学》2006 年第 7 期。

③ 参见陈占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 年第 1 期。

改革、发展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提高、不断深化。^① 有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环境中的本土化过程。它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任何科学理论在特定条件下的运动,而是特指在中国的基本状况尤其是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异化性运用。其基本内涵是在落后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指导意义的具体表现。^② 有研究者从历史的维度将这一过程分解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中国化三个层面。^③

此外,有不少学者尝试多角度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如有研究认为,“中国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维度,即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发展、创新的文化意蕴就是实现了中国的文化转型。^④ 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或精髓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事求是地创造新理论,提出新观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已过时的论断或原理、原则,敢于承认其已过时并在实践中予以放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加以具体化。^⑤

国外学者偏重于从文本与方法论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有着明显的趋同性,但在一定程度上的超前于国内学术界。美国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和中国的历史、社会实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并从母语化、大众化、民族化、具体化和理论创新等五个层次诠释这一结合的内涵。怀利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简洁地概括了

① 参见郭学军、张全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思考》,《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② 参见范洪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分析与深层探索》,《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③ 参见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④ 参见左亚文、韩美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维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⑤ 参见赵明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辨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

中国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的探索,它代表中国共产党认真地尝试以一种大众化的方式去向中国广大民众介绍一种复杂的外来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蕴涵着独特的文化层面。在其文化的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一个国外意识形态学说和中国独特的文化品格相融合的问题。”^①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理解,浓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及其理论成果。我们认为,应当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概念。为此,需要厘定如下内容: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对整体的认识可以是多角度的,但“中国化”始终是把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一是本体论内容;二是方法论内容;三是价值论内容。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也就可以分为这样三个基本层次。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由策略、制度和理念三个层次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需要通三个层次的运用与发展而推进。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是“结合”,但不仅仅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之外,还包括西方现代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选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界诸思潮的关系等多层面的问题。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是中国国情,国情的发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正如有研究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第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用中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如果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一个定义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整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随着中国国情的变迁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以它为指导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②

需要强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的内涵中,体现了独特的文化意

① [美]雷蒙德·怀利著,林育川译:《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

② 参见罗本琦:《新世纪国情特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诠释》,《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蕴和文化使命。中国共产党是在 20 世纪初中国思想大解放、各种文化思潮纷至沓来和新一轮文化大反思的背景下产生的无产阶级政党,新文化运动是中共产生的直接背景。

从严格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一直在尝试着反省传统文化的同时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只是始终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努力。洋务运动在实践上开“中体西用”之先河;维新变法虽然把向西方学习的边界扩展到制度文化,但本质上是“中体西用”的延续,坚定的“保皇”立场足以说明这一点;辛亥革命可以看做是突破“中体西用”的尝试,但没有成功。辛亥革命后,复辟逆流(张勋复辟与袁世凯称帝)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没落激发起进步思想家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一方面,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在加剧了中国人民对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反感的同时,也推动了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思想家们试图在古老的中国寻找文化复兴的希望,但丝毫没有削弱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呼声。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以及巴黎和会上各列强对作为战胜国的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公然侵犯,击破了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梦。于是,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挣脱了“中体西用”的桎梏,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选择,从而开启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以俄为师”标志着中国人走出了洋务运动以来寻求资本主义文明救中国的怪圈。“以俄为师”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也是或者说首先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因此,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就坚定地把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基本任务或者说两重基本含义:其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相结合以解答各个时期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那么这种文化的结合就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条主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主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或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地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扎根、发展。更重要

的是,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靠内部力量推动是很难实现的。

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一脉相承。长期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在使这一古老的文化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与同样沿袭了几千年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相互支撑,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西汉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证明:这一超稳定结构中的文化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消解外来文化的能力。这或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一脉相承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秦汉以来,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域外文化先后传入中国,并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但丝毫没有改变中国本土文化的本质。即使经历了鸦片战争后蜂拥而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也没有发生动摇,换言之,这些外来文化没有成功地推动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型。

因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需要外在的文化力量推动,需要优秀的外来文化元素为之提供新的营养乃至新的方向指引。选择什么样的优秀文化担当这一使命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品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担当起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使命。于是,我们看到,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仅建立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功能实现的如何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如何,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的经验。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或者说作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占有重要地位。19 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传到中国的,因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几乎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一开始也是在文化领域展开,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语言的中国化,即使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或“灌输”(列宁语)本质上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成功的。如果要追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能够成功?人们通常会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等方面回答,这种回答无疑是正确的,但还不够。我们认为,重视文化上的“结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成功地中国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所有西方社会思潮都曾在中国传播,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迟到的真理”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这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在文化精神上相通,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予高度重视,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将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民族文化整合的历史使命,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飞跃”^①。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过一段极为曲折的历史,曲折因何而来?当我们反思这一历史时,不能忽视文化视野中的两个现象:其一,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没有被视为一种文化,而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被扭曲了的工具。实际上,在许多时候,人们甚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多少人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我们不便下结论,也难以统计。但充斥各种媒体的空洞的“革命理论”、在全民族文化水平尚未实质性提高的条件下人人学习“红宝书”的壮观场面,以及这一历史时期的种种不正常现象,至少说明:就整个中国来说,读懂(或者说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的人不多见。其二,中国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扫四旧”是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清除传统文化的运动,支撑这一运动的当然是个别领导人在观念上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从反右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则是对传统的全面清算,是从物质层面到思想层面、从文化载体到文化精神对传统的反动。因而,严格地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于停滞状态。由于文化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抛弃与对传统的否定,“文化大革命”被后人视为闹剧,革命的结果是摧毁了支撑一个民族发展的文化基础。没有严肃文化的支撑,社会主义建设不可避免地受到非理性的、非科学的思想引导。诸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是纲,

① 罗本琦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机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其余都是目”以及“赶英超美”等等,显然都是缺少科学依据和事实依据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重要性。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那么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则是这一伟大实践的先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思想文化上的“拨乱反正”,正是这场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迷信,为改革开放的国策出台扫清了观念上的障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更是文化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以及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例如,“一国两制”的方针,坚持了社会主义主体的发展方向,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符合港、澳、台地区近百来发展的实际。从文化看,“一国两制”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灵活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解决中国国家统一问题的伟大创举。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重大决策与实践无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成果,同时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的成功实践,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分不开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共中央对文化的功能与作用日益重视,对文化规律的把握也越来越准确。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得到肯定和巩固。^①邓小平曾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②“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③

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显然是不准确的——我们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场革命。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